本书写得不错。本书作者包弼德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接受教育的汉学家，同时本书又是面向西方读者的作品，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本书的精华部分可称得上是“片面”的深刻。深刻容易理解，“片面”主要指的是，作者时常在叙述分析的过程中，无意将一些中文环境下的学者一般不会忽视的部分忽视了，其实也并不比其他的著作更“片面”。这有一些好处，如作者也会注意到那些中国学者熟视无睹但实际上也相当重要的细节。由于作者基本站在客观甚至有些同情的立场，本书一些观点上的“瑕眦”不出于偏见，反倒有时比本书其他富有洞见的结论，更能激发读者的思辨。

作者注意到，在750年至1050年之间，南方人口增长超过一倍，但行政机构并没有因此倍增，因而判断行政机构的效率可能出现倒退。但得出这个结论的证据似乎还是有些单薄，还有其他的理由可解释行政机构数量的相对稳定，如行政机构的实际负载增大的幅度尚不至于导致行政效率的下降，或是政府在原来行政机构的基础上招募了更多的行政管理人员。仅就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多直接的、坚实的证据。

笔者首次在本书中看到关于唐朝的政治哲学模式的叙述，即汉朝是在秦朝后首先恢复与上古理想社会联系的帝国，唐朝是第二个，这是唐帝国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也表明，唐朝的政治哲学基本上延续了汉朝的古典逻辑，而略有损益。如果作者依据的唐人的原始史料，则上述内容当是关于唐人对自己时代的认知的基本图式。

宋代经济的发达为作者所肯定，并且将其视为前工业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甚至超过了明末的伟大商业革命所达到的高度。许多学者或是执拗于一个历史断代的内部比较，或是为了证明明末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对宋代经济的这一近代历史前空前绝后的独特现象缺乏感知，这其实构成了“唐宋变革”中极为关键的现象。而作者也未能对明朝为何会与宋朝经济发展相差悬殊作进一步的讨论，这背后之原因也是理学历史的重要背景因素。

作者的“片面“之处，也在于其结论在基本合理的同时，也常常会带有过分夸张的修饰。一种是宋代士人接受世界多元性的说法，另一种则是宋代知识分子对皇权的普遍质疑。后者显然有些极端，但宋人确确实实在政治想象中将皇帝的地位，从说一不二的绝对专制君主，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有所移动。但这一进步显然没有得到巩固或继承，明清两朝专制风气，要远甚于汉唐，这也是华夏文化在宋代的实践失败的一部分。在这样一种普遍风气下成长起来的朱熹，自然更不会抱持所谓“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想法来构建其思想，而且还在“道统”与“治统”相拮抗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一步，虽然亦不成功。

作者特别关注到，理学家理论中对地方自治的重视，鼓励地方精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地方的努力，而不是政府由上至下的强制命令来重建社会的良好秩序。这在宋元时期还只是信奉理学的士人自发的实践，到了明初则成为了朝廷立法强制在全国推行的模式，成为了黄仁宇所说的将全国变成大农村的集合。我们注意到，理学家理论的实践最后仍旧是依靠政府由上至下的命令，而不是人们自主性的行动，正是这一区别对结果造成了莫大的影响，相当程度上加强了对经济发展的抑制而不是相反，使得理学家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建设建立在了极为“原始”的基础上。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实践走向思想者设计反面的例子。

作者的另一创见，即指出理学中的信仰因素，这一点笔者还未见到其他学者的类似意见。笔者认为“信仰”特征确实是理学中的关键因素，但具体的原因并不如作者所说，只是因为“坚持上古的社会秩序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或是对统一性的信仰，这些都不是关键所在。我们认可“信仰”这一特质，是为了表征理学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占据了经院哲学在西方文化史中类似的地位，乃至发挥了近似的作用，“信仰”的说法不啻为其中一相联通的因素。这或许是理解理学的一把钥匙。